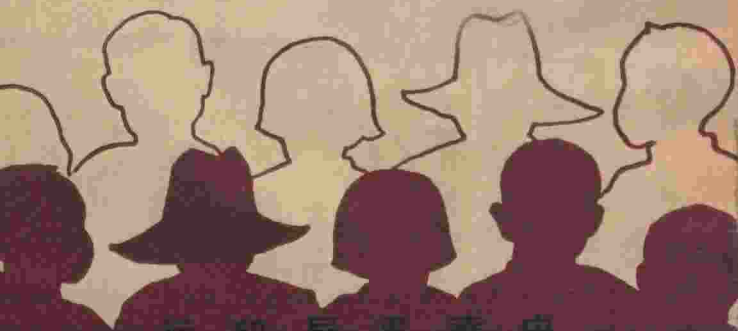


大 衆
文 化 叢 書

中 國 農 民 運 動

解 樹 民 著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中國的農民運動

目次

- 一 中國的農民……………一
- 二 中國農民運動的初階……………一〇
- 三 中國近百年來的農民運動……………四〇
- 四 中國農民運動的現階段……………六〇

中國的農民運動

東北圖書館

一 中國的農民

農民是封建社會裏的可憐蟲，是被封建統治階層壓迫和奴役的對象。中世紀的歐洲社會，是有名的「黑暗時代」的封建社會，封建領主貴族僧侶對農民的奴役是很殘酷的；在中國，周秦以迄清末的封建社會，更是地主官僚商業高利貸者的「王道樂土」，他們二位一體地剝削廣大農民。封建統治階層把一切負擔寄託在農民身上，農民出穀、出錢又出力，終日像牛馬一樣地耕田地服苦役，可是總難得溫飽，毫無生趣。可憐善良忠厚的農民往往逼得無路可走，終於掀起農民武裝起義，把他們的鮮血染紅那無邊的大地。在中世紀歐洲，農民運動曾不斷出現在法蘭西王國、義大利半島、日耳曼帝國和英倫三島及沙皇俄羅斯。在二千多年來的中國大陸上，農民運動更是史不絕書。可以說，一部中國封建社會史，就是一部農民運動史。

滾滾長江流水，斑斑農民血淚，多少可泣可歌的悲壯史蹟，真是說也說不盡啊！

從周秦到清末，中國農民一直在封建地主經濟的貧困統治下呻吟掙扎。在中世紀歐洲領主經濟型的封建社會裏，領主貴族雖然可以在其莊園或采邑裏奴役他們的隸農，但還不能任意地經商放債以廣貨殖，而經商放債的商業高利貸者，也還不能自由地兼併土地，奴役農民。可是，在中國地主經濟型的封建社會裏，封建剝削階級的地主、官僚、商業高利貸者，却一齊對被壓迫階層的農民大眾，張起封建奴役的天羅地網，它那血盆也似的大口，幾乎無所不包無孔不入地把一切都吞沒了。在中國封建地主經濟的貧困統治下，乍看之下，好像有着土地買賣移轉的過早「自由」，和農民生活形態的表面「自由」，可是骨子裏，封建統治階層，却進行肆無忌憚的重重交疊的封建剝削，農民所受的迫害，較中古歐洲封建領主經濟統治下的農奴尤烈。在這種社會裏，凡擁有連阡累陌的土地的地主，既可以通过封建地租這唧筒，來吮吸農民的血汗膏脂，也可以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地買官晉爵或經商放債，而錦上添花左右逢源。土地兼併和重租重賦，是封建剝削的酵母，它孳生着商業高利

貸的凶焰，它滋養着鄉紳土豪的肥軀。一連串封建剝削構成一連串鐵的鎖鍊，緊緊地鎖住農民的頭頸，扼住農民的咽喉。「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宋史——食貨志」）「四民之中，惟農最苦；稼一不登，則富者操奇贏之資，取倍稱之息；偶或小稔，責償未畢，資儲罄然，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絺褐而不完，而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宋史——食貨志」）「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樂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農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納官錢。」（「宋史——食貨志」）像這樣的記載，翻開錢裝書，幾乎到處可見，滿眼皆是。

在中國封建社會裏，農民的封建負擔真是無窮又無盡的：既要出穀，又要出錢，更免不了要出力。我們知道封建地租有三種形態，就是力役地租、實物地租和

貨幣地租。封建專制政府對農民的封建賦課，也幾乎同時具備了這三種榨取形態。有時，封建賦課本身就是封建地租的變相或帶有封建地租的濃厚氣息，成爲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特別是宋、元以來，官田數量日增，農民更直接成爲官家的佃奴。一般地說，農民至少要把收成的一半，作爲地租孝敬給地主，此外，還要支出種種苛捐雜稅。按漢代稅制，田賦算是很輕的，最高不過占農業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最低有只占農業收成三十分之一的，有時甚至全部豁免掉。但這只是對坐食地租的地主們有利。至於那些「無土可稅」「無田可賦」的農民，反而因爲相應着田賦的減輕，帶來了種種繁重的苛捐雜稅，使他們非但未受其益，反受其害。同時田賦的輕微，不啻助長了地主們的經濟勢力和土地貪慾，因而也使農民們的災難有增無已。可見一般侏儒們歌功頌德的此種「仁政」，只有直接間接加深農民的苦痛罷了。在輕賦政策的宣揚下，各種苛捐雜稅，便層出不窮地壓在農民的身上，什麼號稱「口賦」「算賦」的人頭稅啦，名爲「戶賦」的戶籍稅啦，真是花樣百出。史書上告訴我們：西漢「民年七歲至十四歲，出口賦錢，人二十三。」「民年十五以上至

五十六，出算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見「西漢會要」）戶賦每戶出錢二百；「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史記——貨殖列傳」）除了賦稅以外，還有非常繁重的徭役，當時農民每年須提供一個月的無償（義務）勞動和三天的戍邊兵役，凡不服徭役者，則課之以稱爲「更賦」（又分「踐更」和「過更」兩種）的免役費。踐更出錢二千，可免作義務勞動一月；過更出錢三百，可免充戍邊兵役三天。在以實行「屯田」「占田」「均田」相號召的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初唐）各封建王朝，也是力役和物租並取的，所謂「租庸調法」，不外就是物租和力役的別稱而已。初唐流行的租庸調稅法，最爲典型的實例。租爲每丁歲納租粟二石或稻三斛。調爲每戶納絹二疋（每疋寬一尺八寸，長四丈）綾、緇（紬）各二丈，綿三兩；如納布加五分之一，並輸麻三斤。庸是每丁歲役二十日，有閏加二日，不能應役者，改納綾絹緇每日三尺。這是把晉代和南北朝的戶調制、口稅制、徭役制加以擴大和定型化的結果。在晚唐實行「兩稅法」以前，地主們幾乎完全不負擔國家的賦稅，一切封建賦斂，差不多全

部落在農民的身上。兩稅制把「租」「庸」「調」三者合併爲一，改爲只有以錢或實物交納的一種田賦，國家按田畝收賦，照理屬封大地主的田畝，自然也有繳納國賦的義務，而且晚唐廢止租庸調而改行兩稅制的動機，也未始不是部份地基於爲對付地主逃稅和包庇，用「就田問賦」的辦法以裕稅源而固稅本的打算的。可是，實際上，地主們却仍仗勢不繳或隱匿偷漏，所以田賦的負擔，主要還是落在農民身上，地主縱有負擔也都轉嫁到農民身上去。而且，即使於實行兩稅制以後，農民仍不免於徭役之苦。農民所繳的田賦，構成封建政權財政收入的大宗，可以說，封建政權的寶座，就全靠向農民抽取血汗膏脂而維持不墜。像在清代乾隆三十一年，國庫收入計銀四千萬兩，而其中田賦一項即達三千二百萬兩。清初制定江南賦額爲四百萬石，但實際上江南農民要繳一千四百萬石。在此種明搶暗奪層層剝削之下，農民負擔的沉重，可以想見。農民所受封建地主的榨取奴役，是與日俱增的。由於交換經濟的漸趨發達，使地主們的貪慾隨之擴大，因而對農民的封建榨取也不斷加甚了。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大地主包庇下的民戶，實際上成爲他們的農奴，特別是唐

宋大地主莊園制興行，莊園中的佃農更與農奴無異了。土地兼併自宋元以來，更是變本加厲，到清末實已達到驚人的程度，農民無地化過程不斷加速。失地農民的充斥，意味着佃農後備軍的擴大，這更給貪婪的地主們，以加深封建榨取提高封建地租的有利條件。等到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的大門，從此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解體，急劇地向殖民地深淵沉淪下去。中國農村更趨崩潰，農業和手工業的連繫為潮水般湧入的舶來品所衝破。農民的負擔固已加重，而農民的生計却更加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貧困統治給農民帶來的是更大的負擔，更大的災難！

不言而喻，在封建地主經濟的貧困統治之下，農民生活真是痛苦到了極頂。漢代一位大思想家（鼂錯）描寫當時的農民生活，曾這樣地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價而

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債者矣。」（見「漢書——食貨志」）

僅此通常負擔，農民已苦痛萬分，再加上「已奉穀租，又出棗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去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見「漢書——貢禹傳」）真弄得民不聊生了。至於一般佃農，則誠如董仲舒所說：「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見「漢書——董仲舒傳」）這樣，就連王莽這大奸雄也說：「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癯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混戰，農民死亡載道，而劫後災黎，又遭遇隋唐王朝的暴虐統治，當時農民生活的痛苦，誠非筆墨所能形容。杜甫、白居易的詩篇可也真够悽婉動人了：「車轡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杜甫「兵車行」）「歲暮天地閉，

陰氣生破村。夜深烟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年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並入鼻中辛。」（白居易「秦中吟」）而再往後，經過五代十國的大戰亂大擾攘，農民的貧困更有增無已。「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商業高利貸的魔手更猛襲着貧苦農民，這不啻又一道催命符咒。宋代農民的處境真悲慘：「水旱霜雹蝗蟻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絺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宋史——食貨志」）等到農民走頭無路生計蕩然的時候，揭竿而起的農民武裝暴動，便一次次掀起在古老中國的大陸上了。

這就是二千年來中國農民的生活真相。

二 中國農民運動的初階

從秦漢到清末，曾不斷爆發過無數次農民武裝大起義，爲中國封建社會史，抹上一層層鮮紅的血跡，一片片苦澀的淚痕，而所有這一時期的農民起義，都帶有極其原始而粗獷的氣息，很少有過明確的政治意識，或是強有力的組織和領導。本來，善良樸實的貧苦農民，慣常於刻板的農作、散漫的居息，他們過不惜集體的生活，擴展不開廣大的眼界和遙遠的視野，他們爲土地的追求所迷惑，他們是純粹的經濟主義者，只要略獲衣食之資，便頹然滿足了。就像一位學者所說：在封建時代，農民在戰爭中不管有多大的力量，發展到最後，總不免於失敗。縱然他們推翻了一個代表地主官僚商業高利貸者階層利益的專制王朝，但他們並不能建立他們所理想的、合於農民利益的社會秩序，地主勢力又以另一個專制統治者爲代表而興起。走向城市的失敗，幾乎是這一長時期中所有一切農民暴動的通例。這一方面，是因爲在農民軍佔領了城市後，往往使封建統治階層爲救亡圖存而一時竟能團結起

來，用種種卑劣的手段來打擊和分化農民，甚至勾通外敵夾攻農民；另一方面，是因爲農民本身的弱點，從此更加暴露和發展起來。他們並不能聯合城市工人和小市民，組織成反封建政權統治的統一戰綫，也不善於利用城市的同盟軍和同情農民的力量。而且事實上，當時也找不到有力的同盟軍：那裏有的只是一些小手藝人和小商販，這些人並不能給農民增加多少力量。而更有那些不事生產的城市流浪漢，他們不但不足以增強農民力量，反會因其已養成很壞的習性，竟對農民發生消極破壞的作用。自然，城市對於質樸的農民，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所起的腐蝕作用，也是無可忽視的。總之，這一時期的農民運動，可謂嚴格意義上的農民運動的初階，它的特徵，是缺乏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強有力的領導，是它的政治意識的貧弱性，是它的組織行動的散漫性，是它的走向城市的失敗。這一初階期的農民運動，其賦有代表性的大事件，可分三段時期來敘述：第一，是秦漢期的陳勝、吳廣揭竿起義，赤眉銅馬反莽興兵，和張角兄弟的黃巾起義；第二，是唐宋期的黃巢起義、王小波起義、方臘起義和鍾相暴動；第三、是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農民大起義。

讓我們先從秦漢期說起。

先秦戰國時代，列國紛爭，諸侯多成爲商業高利貸者的債戶，商業高利貸者逐漸代替舊封建領主地位，一躍而成爲新興的封建地主。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寡」，從此新興地主便公然地走上了歷史的舞台，而秦國的政權也變成了商人地主官僚的政權了。等到秦王政（秦始皇）併吞六國混一宇內，封建地主政權便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中國封建領主經濟向地主經濟的轉化過程遂以完成。這就農民而言，只是換了一次主人，壓在頭上的不再是封建貴族領主，而是新興的封建地主，但並未絲毫減輕其封建負擔。暴秦之世，單正稅就有取稅什一的地稅，歲率戶二百錢的戶賦，民年二十三至六十五歲的兵役，而種種苛捐雜稅和徭役之征，更是不計其數。「漢書——食貨志」所載：「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可謂真實的描寫。據「史記」當時的農民苦役，最著名的有：（一）大興土木

廣作宮室——「始皇二十六年，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徙刑者七十萬人，乃分作阿房宮。「至秦二世時復作阿房宮。」

(二)築長城作馳道——「始皇三十三年使蒙恬築亭障以逐戎人。」「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三)穿鄜山建皇陵——「始皇初卽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此外，封建帝國爲了肆行對外殖民戰爭，更動員三十萬農民北伐匈奴，五十萬農民南征五嶺，間接因戰爭而耗費的民力更不計其數。農民生活悲苦萬分，「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農民怨氣沖天，盼望始皇帝死而地分。及始皇死，二世胡亥繼立，「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征兵的命令急於星火，如遲誤限期則處死刑。爲了滿足皇帝「狗馬禽獸之欲」，「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弄得「刑者相半於途，而死人日成積於市」，「農民忍無可忍，便紛紛揭竿而起，作求生的反抗鬥爭了。」

秦二世元年（紀元前二〇九年），有戍卒九百人於開赴河北漁陽途中，在江蘇沛縣大澤鄉爲風雨所阻，誤失行期，依法當斬，在九百人中，大半數是飢餓的農民，他們的領頭便是陳勝和吳廣。陳勝非常悲憤地對他的同伴們說：「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常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豈有種乎？」於是九百農民便揭竿而起了。不久鄰近的貧苦農民競相響應，不到一個月，陳勝的旗下便有「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萬餘人」了。及起義軍進據陳縣（河南省），聲勢更一天天擴大，旬日之間，飢餓的農民，不召而集於陳縣者數萬人。同時久經逃亡的舊貴族，也都紛紛投入陳勝旗下，陳勝自號張楚王，被推爲起義軍的首領。陳勝本來是雇農出身，並沒有受過相當的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他的伙伴也都和他差不多。入夥的舊貴族詭計多端，純樸的農民那裏是他們的對手，他們從陳縣的政府中排除農民派的勢力，並逐漸把農民的武裝轉移到自己的手中來。陳勝在大批舊貴族包圍下，也漸漸地腐化了。他稱王不久，便忘掉自己的階級立場，失掉了農民的信仰，不再是農民的領袖，而是貴族的傀儡了。

所以起義不滿六月，便遭遇敗亡的命運。不過農民運動雖在失敗中結束，但封建王朝的基礎卻爲之動搖，舊貴族死灰復燃，秦代政權也就被顛覆了。

農民希望「始皇死而地分」，以武裝起義來反抗暴秦的封建虐政，農民戰爭雖沒有主動地解決土地問題，但在客觀上却也相當減輕了土地問題的嚴重性。在戰亂之餘，「大城名都，人民散亡，戶口可得而數，才十二三，是以當時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擺在西漢王朝眼前的任務，已經不是人多地少如何解決土地分配的問題，而是地多人少如何羅致勞動人手的問題。於是新政府便令「兵皆罷歸家」，令「民以飢餓而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在農民復員以後，政府遂命郡縣清查戶口，編造名籍，「漢書」上常有「占名數」於某處的記載，便是爲了征收賦稅分派徭役的方便。翦伯贊先生說得好：「現在土地都扞上了標牌（按土地已爲皇室、貴族、官僚、舊地主及退伍將士所分占而農民沒有份——作者），新舊地主都回到了原籍或新籍，而農民們也只得找出那生了鏽的鋤頭，重新去做佃農或雇農。暴風雨已成過去，又是一片蔚藍的天色，當農民們走向田野去的時候，看看身

上的創傷，回想過去大澤中的起義，他們覺得正像一場大夢。」

隨着農業生產力的向上發展，土地兼併的現象日甚一日。西漢之世，「官家（對地主）之惠，優於三代，豪強（對農民）之暴，酷於亡秦，今豪民占田，或至數千百頃，富過王侯。」一時「豪猾之徒，武斷鄉曲，帝王強圈民田，豪右肆其侵占。」馴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而商人地主自從在新政府的恩詔之下，獲得了土地所有權的恢復與政治地位的承認以後，不久以其蓄積，展開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和土地兼併。當時「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敎，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難怪鼂錯要嘆息地說：「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加之在成帝即位以後的二十六年中，嚴重的天災，更繼續不斷地襲擊着當時的農村，弄得農民生者「困乏不能自存」，死者「不能自葬」。「漢書」上說當時農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

誠可爲酸鼻。」「封建貧困統治，隨時隨地會致農民於死命：「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農民要死裏求生，於是，終於「部落鼓鳴」而「盜賊橫發」了。不久，緊接着王莽因改良主義的失敗而走向更反動的暴力統治之時，中國的歷史又走進了一個暴風雨的時代，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又掀起在古老的中國大陸上了。

農民武裝起義最初從西北邊境五原、代郡一帶爆發，接着在長江流域也爆發起來。當時鄂西連年大旱，農民相率在野澤中採草根爲食，而政府尙加以無情的榨取，於是成羣的飢民相與嘯聚，推戴新市（京山縣）人王匡、王鳳爲首領，在今日當陽境內的綠林山，揭起反叛的旗幟，一時聚衆五萬人以上。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

「綠林兵」。後來綠林兵更分爲南下南郡（荊州）的下江兵，和北入南陽的新市兵；而平林境內（在今隨縣東北）數千農民軍，也響應新市兵的起義，號稱平林兵。緊接着鄂西的農民起義，山東、蘇北的青、徐一帶，更爆發了廣大的農民起義。山東飢民共推瑯琊人樊崇爲首領，以泰山爲根據地，聚衆數萬人。繼樊崇之後，山東河北飢民，四方蠶起，據「後漢書——光武本紀」說：「（當時）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由此可見當時農民起義軍聲勢的浩大了。王莽派太師廉丹、更始將軍王匡率官軍十餘萬，進攻農民軍，樊崇「恐其衆與莽軍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兵擊敗官兵後，又獲銅馬等生力軍的參加，聲勢更大，一時山東、蘇北、皖北、河南、河北，都是赤眉的天下。正當赤眉席卷華北時，南方新市、平林的聲勢，也在日益擴大中，這時商人地主份子劉玄、劉縯、劉秀等，成爲新市平林的首領，劉玄自立爲更始皇帝，並殺劉縯而獨攬大權，分兵兩路攻入關中。當此之時，赤眉正散布於

汝南、潁川、陳留一帶，飢餓無以爲食，曾要求劉玄解決農民的飢餓問題而未果，於是乃進軍長安，立一位農民軍的領袖並號稱景王之後裔的劉盆子爲帝。這時轉戰河北的劉秀，更顯露其猙獰的本來面目，開始屠殺赤眉、銅馬等飢餓的農民軍。農民軍一部分在飢餓中死去，一部分在戰爭中死去，其餘則爲野心家的地主商人份子收編；在農民的屍骨上，劉秀終於建立了東漢政權。

西漢的土地問題到哀平之世，便達到了嚴重關頭。王莽改良政策失敗，引起了新市、平林、赤眉、銅馬的農民大起義，但嚴重的土地問題，仍然未因此而稍獲解決。東漢政府處理土地問題的辦法，依然和西漢一樣，以地主的土地還地主，以農民的犁鋤還農民。據應劭「漢官儀」載稱：「世祖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才十二三。」一時土地問題的嚴重性，也相應着人口的銳減而減輕。但東漢王朝創立以後，並未給農民以喘息的餘裕，與農業生產技術發展的同時，土地兼併的過程又不斷加速，而封建王朝的賦役之征也復趨繁重了。靈帝把他聚斂得來的錢財，拿來買田宅，起第觀，作窖藏，和供他一己的任意揮霍。連他的臣子（呂強）都看不過

去，說是「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再看當時商人地主的寄生生活，也真腐化奢侈到了極頂。「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睥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賞也。」「豪人貨殖，館舍遍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見「後漢書——仲長統傳」）而可憐那些被人壓榨的農民，則「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賦稅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飢不敢食。」（「後漢書——呂強傳」）結果竟演成人吃人的慘劇：「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後漢書——靈帝紀」）農民求生的本能，終於帶來了農民運動的新高潮，東漢王朝便在黃巾起義後不久而宣告垮台了。

鉅鹿人張角，爲貧苦無告的飢餓農民帶來了一綫希望，他用宗教的聖水，鼓舞起絕望了的農民羣衆，領導他們向封建政權作求生的反抗鬥爭。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創立太平道教，派遣學徒八人至全國各地傳教，十餘年間，得信徒數十萬人。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潛伏勢力最大。張角部署信徒爲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設將領統率部屬。又散佈流言說：「蒼天（漢王朝）已死，黃天（張角自稱）當立，歲在甲子（靈帝中平元年，是甲子年），天下大吉。」在京城及各州郡官府的大門上，到處都可以看到用白粉寫成的「甲子」兩個大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計劃先收荆、揚二州數萬農民，到鄴地（河南臨漳縣西南）集中。元義往來京城，與宦官張讓、封諱、徐奉等勾通，作爲內應，約定三月五日內外一齊發動。不料事洩，二月，元義被捕死。張角乃通知三十六方立刻起義，並自稱天公將軍，弟張寶稱爲地公將軍，張梁稱爲人公將軍，軍中都戴黃巾，所以官方稱這些農民軍爲「黃巾賊」。黃巾二月起義，不過十幾天，全國響應，到處焚燒官府，攻打城邑，州郡官吏，紛紛逃亡。後經官軍進擊，農民軍被屠

殺者達三十萬人以上。張角兄弟也都光榮地戰死了。但飢民愈殺愈多，中平二年，黃巾的餘衆和各地飢民，又打着各種各樣的旗號，出現於河北原野。據「後漢書——朱儁傳」載稱：「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晒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氏根，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到中平五年，黃巾復起，據「後漢書——靈帝紀」所載：「五年二月，黃巾賊郭大等起於西河，寇太原河東。四月，汝南葛陂黃巾，攻沒郡縣。六月，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史郗儉，自稱天子，又寇巴郡，殺郡守趙部。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黃巾的暴動，繼續了十年之久，一直到獻帝初平四年，才沒入豪族的部伍中。而「黑山賊」則直

至獻帝建安十年，才由張燕率領投降曹操而轉化爲官軍。此外，與黃巾暴動同時，在蜀郡，張修、張魯，也創立五斗米道教，吸引大批貧苦農民參加反抗政府的叛亂隊伍，一直到獻帝建安二十年，才爲曹操所平定。

再看唐宋時的中國農民運動。

東漢末年軍閥混戰，農民流離失所，農村土地荒蕪，曹操就把荒地收歸國有，派官管理，實行屯田。屯戶和官府按一定比例分配農田的收成：用官家的牛的，屯民得四分，官府得六分；用屯民自己的牛的，對平均分。西晉官府更把地租提高到二八分（用官家的牛，屯民得收成的十分之二，官府得十分之八），或三七分（用屯民的牛，屯民得收成的十分之三，官府得十分之七）。就在這同時，私家大地主的勢力也格外囂張了。當時貴族豪門大地主都擁有廣大田莊，包庇許多莊客，不納國賦，西晉政府想增加稅收，穩定生產，便頒行「占田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

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並從而頒布戶調法：「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寶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這樣，政府的稅收固增，農民的負擔固重；可是地主的聲勢並未稍減。晉室東遷，江南原來的地主勢力就很大，新遷來的權貴豪門更紛紛占奪土地，競相兼併。這時在北方也因久經戰亂，農民流離失所，農村荒蕪殘破，鮮卑族拓跋魏王朝就占奪了大批荒地，實行「均田制」，招收流亡農民分配耕種：「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這樣賦課便從而有了着落：「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唐代承長期戰亂之後，爲了恢復生產，撫輯流民，以裕稅源而安地方，也實行所謂均田制，丁男給田一頃，納「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前者永久定業，後者有授有歸。而著名的租庸調稅法，便是建築在均田制的基礎上的。此種均田制的不均，只要一看貴族都永業田一百頃至五頃，官吏有職分田

十二頃至二頃的規定，便可思過其半了。玄宗天寶以後，土地兼併愈烈，均田制破壞無餘，租庸調法也不得不改爲兩稅法，而苛捐雜稅並不因此而稍減。這時「諸州百姓，多有流亡，或官吏侵漁，或盜賊驅迫，或賦斂不一，或征發過多。」誠如「新唐書——食貨志」所載：「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籩、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再加上地主商人的兼併剝削，農民的痛苦更甚。大思想家陸贄說得好：「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畝稅五斗，而私家收租一石。」（「陸宣公奏議」）當僖宗乾符元年，正值陽春時節，已經起了很大的飢荒。據盧攜的奏章所說：「關東去年旱災，自虢（今河南靈寶縣）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爲麪，蓄槐葉爲齏，今所在皆飢，無所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征，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僱妻鬻子，止可供所由（所屬官司）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倘不撫存，實無生計。」事實上，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日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農民走頭無路，終於「相聚爲盜，所在蜂起，是歲（僖宗乾符元年）濮州（山東濮縣）王仙芝始聚數千起於長垣。」「夏五月王仙芝陷濮州，冤句（山東菏澤縣）人黃巢聚衆應之。民困於重斂者爭投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通鑑」）農民運動的狂潮又一次席捲在大中國的大陸上了。

自王仙芝、黃巢率衆起義後，淮南忠武（陳許等州）、宣武（宋亳潁等州）、義成（衛滑等州）、天平（鄆曹濮等州）五節度使轄地人民紛紛響應，大部千餘人，小部數百人。乾符三年，王仙芝攻陷申光、廬壽、舒通等州，又攻蘄州（今湖北蘄春縣），忽爲朝廷所誘降，經黃巢力阻士兵譴諫始止，乃大掠蘄州而去。黃巢從此與王仙芝分兵。四年，王仙芝又受朝廷招撫，事不果成。五年，王仙芝兵敗身死。黃巢軍自蘄州北上，收附仙芝餘衆，衆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朝廷發大軍守洛陽，兵力頗厚。巢引兵渡江攻陷虔（贛縣）、饒（鄱陽）、信（上饒）、吉（吉安）等州，引兵入浙東，攻福建；六年，轉入廣東。因遭疫死亡極大，定計北還，自桂林沿湘江直下

潭州（長沙），乘勝進逼江陵，攻鄂州（武昌）饒、信、池（貴池）宣（宣城）歙（歙縣）杭（杭縣）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人。復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攻泗、申、潁、宋、徐、兗等州，轉入汝州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檄告各地官軍說：「你們各守本壘，勿犯我兵鋒，我要入東都（洛陽），轉往西京（長安），替百姓伐罪魁，不干你們的事。」果然，黃巢率領下的六十萬農民軍攻破洛陽，佔領長安，安撫居民，秋毫無犯，人民夾道歡迎。巢將尙讓對民衆們說：「黃王起兵，本爲百姓，不像李家（唐代王朝是李姓）不愛你們，你們儘管安居樂業好了。」巢軍見路旁貧民，爭投財物贈送。不久，唐室勤王之師四面來會，巢勢漸衰。唐又引外援沙陀兵攻巢，巢力戰不勝，棄城而走，出商山入河南境，攻蔡、洛、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沙陀兵大敗巢軍，巢自殺身死。黃巢起義凡十年而兵敗身死，但唐朝三百年的統治，却爲之摧毀了。

經過五代十國的大混戰，農民又成爲趙宋一統江山的墊腳石。不管是耕種官田或私田，農民的負擔總是十分沉重的。當時免賦田畝占十之七八，一切軍費、徭

役、租賦都落在十分之一二的自耕農田上。「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回顧，指麾於其間，而屬役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而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通攷——田賦攷」）這是封建地主所加於農民身上的剝削，而封建政權對農民的賦課，除正賦外，還有所謂折變、支移、寬剩等苛例，比之隋唐更是變本加厲了。從北宋開國起，農民暴動便接二連三地到處爆發起來，從沒有停止過。特別算得上波瀾壯闊、旗幟鮮明的，有王小波、方臘和鍾相的三次起義。

太宗淳化四年，四川稅賦奇苛，民不聊生，「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趨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併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農民們真是忍無可忍，便高舉了起義的大旗。「青神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

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影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已而小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衆至數十萬。」（「綱鑑輯覽」第七十三卷）「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節，大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飢，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宋沈括「夢溪筆談」二十五記）

北宋國用，大部份取給江浙，徽宗時剝削更甚。徽宗宣和二年十月，睦州（建德）青溪縣（淳安）方臘率衆起義。我們從他的悲憤言辭中，可見當時農民所受迫害之甚，朝廷腐敗之深。方臘向農民們演說道：「國與家本同一理，比如子弟耕織，終歲勤苦，少有粟帛，父兄悉數取去浪費，略不如意，鞭笞殺戮，毫不憐惜。他們任性浪費不窮，還奉送大量財物給仇敵（契丹、西夏），仇敵得財物，更富實橫暴，侵侮加甚。他們恐懼無策，驅迫子弟出去抵禦。子弟力不能支，遭受責罵刑罰，無所不至。歲貢仇敵的財物，却不因侵侮而停止。這樣的父兄，你們能容忍

麼？現在朝廷行事，與此何異？君臣們聲色狗馬、營造禱祀、甲兵花石等浪費以外，歲賂西（夏）北（遼）二虜銀絹百萬，這都是我們人民的膏血。二虜得賂，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止，朝廷忍辱納幣不敢廢，宰相還說這是安邊的上策。受苦的是我們百姓，一年到頭勞動，妻子凍餓，求一頓飽飯不可得。這樣的朝廷，你們能容忍麼？」方臘的話句句打進農民的心窩，人民推他做起義的首領，號稱聖公。方臘初起義，有衆千餘人，不到十天，就達數萬，攻擊青溪、睦州、歙州、衢州，乘勝進破杭州。一時蘭溪縣靈山寨主朱言、吳邦，剡縣（嵊縣）魔教主仇道人，仙居縣人呂師囊，方岩山寨主陳十四公，蘇州人石生，歸安縣（吳興）人陸行兒等，起兵響應，東南震動。徽宗遣童貫率大軍十五萬擊方臘，臘兵敗身死。童貫出兵一年半，殺起義軍十五萬人，平民二百萬人以上。反動的封建政權，對外敵無恥地奴顏屈膝，對人民殘暴地亂加殺害，這在歷史上從來便是如此的。

農民起義一次次地被暴力壓伏了下去，可是，造成農民運動的社會因素，却依然強烈地發展開來：「宋之季世，稅法爲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

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併，售必膏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俯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私攤逃戶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榨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貪虐相資，誅求不輟，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老百姓）窮蹙，羣起爲盜。」（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六十五）當時洞庭湖沿岸是最饒足的米倉，貧富對立的現象也就特別來得厲害。當以高宗爲首的王朝正在肆無忌憚地掠奪農民的時候，洞庭湖西岸武陵的農民鍾相，便以「等貴賤、均貧富」號召農民起義了。「建炎四年，正月甲午，鼎州（常德）人鍾相作亂，自稱楚王。環數百里間，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遂焚官府城市寺觀及豪右之家，凡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之流，皆爲所殺。」有衆四十萬人，有地十九縣，稱宋法爲邪法，稱殺人（統治階層）爲行法，稱沒收財產爲均平。焚官府殺官

吏是要消滅貪污，焚城市是要消滅富商大賈，焚豪富大戶是要消除土地兼併，殺儒生是要消滅大小劣紳，殺僧道巫醫卜祝是要消滅愚民政策。凡鍾相的徒屬，都自己耕耘，自食其力。沒收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一時「田蠶興旺，生計豐富」，「人家樂附而從之，以爲天理當然」。宋室無恥，任命巨盜孔彥身爲荊湖南北路提殺使，會同官軍合擊鍾相，孔賊密派特務投附鍾相，內應外合，進攻鍾相，相兵敗被殺。

最後說到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經過元末二十餘年大戰亂，中原赤地千里，朱元璋在農民的屍骨上建立了大明王朝。當開國之初也曾做些「休養生息」的工夫，可是事實上土地兼併之風更變本加厲，官田、皇莊、藩王莊田、權貴莊田的數量巨大得怕人，私家地主的聲勢也更加高張起來。在土地兼併過程中，私租官賦不斷增加，農民貧困日甚一日。特別是生產較豐的江南，農民的負擔尤重。蘇、常、嘉、湖諸府田賦一畝有至二三石者，農民多逃亡路塗，事實上江南之田，十九都已沒入官府了。當時佃農的生活之苦，

從王弼「永豐謠」中可見一斑：「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水閘），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坐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官田賣給富家）；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接新債。舊租了，新債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再回首北望，農民疾苦不減江南：北畿（河北）採辦加派頻仍，順天府所屬州縣，「其夏秋常賦，原額折銀不過十萬九千六百兩有奇，其額外加編銀反至十一萬三千六百兩有奇。」以致宛平、大興二縣戶口「有全里逃亡無一戶者，有餘二三百戶者。」（「嘉靖實錄」四十三年七月己未）山西省「地瘠民貧，大異中原，而王糧邊餉，民間敲扑，幾乎剜肉醫瘡，乃加派一項，至三十九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兩，真踰閩廣二三倍；而垣曲等處，復派之不均。」（「皇明世法錄」卷三十四）「山西預征草豆，每夫料銀至二十兩！歲旱民飢，逃亡載路。」（同前書）「百里不聞鷄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市。」（「明臣奏議」卷

十二）「陝西省地瘠民貧，與山西相伯仲。然而有司不察，加以催科，與名邦大都同列。」（「皇明世法錄」卷三十四）崇禎二年，給事中馬懋才奏呈陝西飢荒情況：「臣是陝西安塞人。臣見諸臣說各省人民窮苦有父母棄子、丈夫賣妻，食草木根或白石粉等情事，比臣故鄉延安府，却還不算最苦。延安府已一年不下雨，八九月間，人民食山中蓬草，到十月，改食樹皮，年底樹皮剝盡，改食石粉，幾天後，腹脹下墜，必不能活。安塞城西一帶，每天有棄兒數人，呼喚父母，餓極拾糞吞咽，第二天棄兒失蹤，被飢民抱去煮食了。城中人不敢單身出城，一出城門，便被捕食。飢民食人，不出數日，面目紅腫，發燒病死。各縣城外掘大土坑，每坑埋葬數百人。總之，慶陽延安以北，飢荒十分嚴重，盜賊搶掠，反成小事。西安漢中以南，盜賊十分嚴重，飢荒比陝北輕些。」特別是自崇禎卽位以來，災荒頻仍，飢饉洊至，生民塗炭達於極頂：「崇禎元年夏旱，畿輔赤地千里，陝西飢，延鞏民相聚爲盜。二年山西、陝西飢，五年淮陽諸府飢，流殍載道。六年山西、陝西大飢，淮陽洊飢。七年京師飢，太原大飢，人相食。九年南陽大飢，有母烹其女者！江西

亦飢。十年浙江大飢，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十一年兩畿、山東、山西、陝西、江西飢，河南大飢，人相食！十三年，北畿、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浙江、三吳皆飢。自淮而北至畿南，樹皮食盡，發瘞瘠以食！十四年，南畿飢，山東海飢，德州米斗千錢，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大盜滋矣！」（「明末十四年間」）可憐這時農民「皮骨已盡，救死不贍，不得已，逼而爲盜。」（畢自嚴「覆陝西延慶等處蠲緩賑恤疏」）於是，如火如茶的農民大起義便掀起了。

崇禎元年，固原兵變，劫奪庫銀，白水民王二、府谷民王嘉允、宜川民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等同時並起，安塞響馬高迎祥與飢民王大梁聚衆響應。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三年，陝西起義軍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庵、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八大王（張獻忠）等到處發動。四年，明將曹文詔擊殺王嘉允，餘衆推紫金梁（王自用）爲首領。自用結合老回回（馬守應）、曹操（羅汝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閻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上天龍、蝎子塊、過天星、混世王及高迎祥、張獻忠等共三十六營，

衆二十餘萬，攻掠山西。八年，起義軍首領集河南滎陽縣大會，老回回、曹操、革裏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及高迎祥、張獻忠等共十三家七十二營。高迎祥部將李自成倡議分兵與明軍力戰，寧敗不投降，衆首領從李自成議，推定革裏眼、左金王敵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射塌天、改世王敵陝西兵，曹操、過天星守黃河，高迎祥、張獻忠及李自成功東方，老回回、九條龍往來策應。

米脂縣人李自成，幼年在本縣大戶人家當牧童，年長善騎射，充銀川驛夫，犯法逃匿，作屠夫謀生。舅父高迎祥起義，自成投軍，號稱闖將。崇禎七年，自成與姪李過結合李雙喜、顧君恩、高傑等部自立一軍。李過、高傑善戰，顧君恩善謀，李自成聲名漸著。八年，十三家首領大會滎陽，自成提出堅決抵抗和分路攻戰的建議，得衆人同意，此後自成地位得與張獻忠並列。九年，高迎祥敗死，自成被推爲闖王。他檄告天下，指斥統治集團的罪狀說：「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

完全違反農民的利益，剝奪人民的生存權利。接着他特別強調他們是代表農民利益，出身農民階層的。他說：「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各營有擅殺良民者，全隊皆斬。」他提出鮮明的政治口號：「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以除力役、免賦稅、保障生活相號召，並以所掠豪富資財分散貧民；老百姓喜歡極了，稱之爲「李公子仁義兵」。十四年，攻陷洛陽，殺福王常洵，發王府金銀散給貧民。轉攻開封，大敗明各路援軍。曹操（羅汝才）、老回回（馬守應）、革裏眼（賀一龍）、右金王（賀錦）、爭世王（劉希堯）、亂世王（蘭養成），先後來附，自成兵力益盛。最初起義十三家七十二營，這時敗滅略盡，止剩李自成、張獻忠兩軍。自成據襄陽，獻忠據武昌。自成自稱新順王，稱襄陽爲襄京，高州爲均平府。獻忠畏自成，南走長沙。河南、湖廣、江北各起義軍悉聽自成號令。崇禎十六年，自成大會文武官議用兵方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攻北京，楊永裕請先取南京，顧君恩請取關中，自山西攻取北京。自成從顧君恩議，率大軍入河南，大破孫傳庭軍。十月，陷潼關，

長驅入西安，分兵取寧夏、甘肅。十七年正月，自成自稱大順王，改元永昌，任牛金星爲天佑殿大學士，增設六政府尙書，定軍制，有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開科取士，廢八股，改用策論。二月，自成渡河攻下太原、大同，入居庸關。三月十三日，破昌平，先鋒至北京平則門（卽阜成門）。十七日城外明軍三大營兵變，守城軍放空銃礮，不肯迎戰。十八日，守軍開城門迎自成。十九日，崇禎皇帝登煤山自縊死，明亡。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攻自成，自成兵敗自縊死。李過改名李錦，與諸將領奉自成妻高氏降明總督何騰蛟，繼續與清兵力戰，至死不屈。

張獻忠，延安縣柳樹澗人，起初在延綏鎮當兵，犯法當斬，得軍官陳洪範救免，逃走爲民。崇禎三年，陝西起義軍大發動，獻忠據米脂十八寨，自號八大王。八年，十三家大會榮陽，議定獻忠與高迎祥、李自成東進，破鳳陽府。迎祥、自成歸陝西，獻忠留攻江北各地。九年，獻忠入湖廣，當時河南湖廣起義軍凡十五家，獻忠一家最稱強大。十六年，據武昌稱王，發明楚王府藏金賑飢民，蕪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降附。李自成據襄陽稱王，獻忠畏懼，走入湖南，破岳州、長沙、衡州，又

破江西吉安等州縣。十七年，獻忠率軍入四川，破成都，自稱大西國王。清世祖順治三年，獻忠焚成都宮殿，率衆出川北，所部川軍將領劉進忠叛降清軍，引清軍自漢中進襲獻忠，獻忠受傷死。義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率餘衆奔川南，歸降明永曆帝，力抗清兵。

三 中國近百年來的農民運動

近百年來的中國農民運動，無論在規模上、在性質上都有飛躍的發展，和初期的農民運動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一九二七——一九三四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土地革命和農工蘇維埃，更使中國農民運動走上歷史的新頁，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豐富內容。

滿清外族的封建統治，變本加厲地迫害善良的農民大眾，生產手段的土地更成爲統治階層掠奪的第一目標，滿清皇帝就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地主，在強迫圈占之下，大批民田變成了所謂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莊田、駐防莊田、屯田、官田，農民賦役負擔奇重，巧立什麼「火耗」「平餘」「漕折」等等名目，剝削的花樣真是層出不窮。再加上貴族官僚、地主、商業資本家、高利貸者剝削階層的兼併榨取，農民無地化、赤貧化的過程格外加速。「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爲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一邑之

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有田者只十分之一，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當時擁地三千畝以上的地主，比比皆是。在江蘇、河北、山西諸省有擁地萬畝、十萬畝、百萬畝以上者。在地主、官僚、商業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貧困統治之下，百業之利多投於土地之上，結果不但原始資本蓄積很難實現，而且連封建農業生產也趨起不前。晚清耕地面積一直沒有超過明朝的數字，便是很好的說明。

這時資本主義列強的大戰攻破了古中國的萬里長城，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開始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過程，舶來商品潮水似地湧進中國，農村手工業遭受了致命的打擊。滿清政府只知加緊壓榨農民的血汗膏脂，不但對外來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侵略不加對抗，而且竟存了「寧贈外邦，不給家奴」的瘋狂卑劣的心理，中國農民身受滿清封建統治和列強帝國主義侵略的雙重迫害，真是苦痛到了極頂。鴉片之戰後的華南，甲午之戰後的華北，特別成爲水深火熱的農民地獄，從那裏先後爆發了農民運動的烽火，不旋踵而蔓延了大半個中國大陸。前者是太平天國起義，後者是義和團起義。先說太平天國。

和中外歷史上許多農民運動總是帶有濃厚的宗教氣味一樣，太平天國的興起也是假託於宗教的：「朱九疇倡上帝會，誓以恢復明室爲志，洪秀全與同邑馮雲山往師事之。九疇死，秀全被推爲教主，後以傳教遊廣西，居鵬化山。」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出身中農，因不滿當時社會，遂有志革命。見上帝會（又稱三點會）可以號召羣衆，遂與同鄉馮雲山同往加入，後被推爲教主，便把基督教解釋成爲他自己的宗教。以耶和華爲天父，基督爲其長子，自稱爲耶和華的次子，吸取基督教的原始教義，主張一切人類都應平等，倡導宗教共產主義。這時和秀全、雲山共同圖謀革命的，有桂平燒炭工人楊秀清，武宣農民蕭朝貴，桂平地主富商豪紳韋昌輝，貴縣紳富石達開，和天地會首領湖南衡山縣人洪大全。參加他們這個領導集團的有農民、手工業工人、運輸工人、會黨、流氓，以及一部份失意的讀書人、被欺壓的地主商人。當時南方諸省的破產農民與失業游民正在各地發生騷動，其勢洶洶，如慶雲的張家福股，柳州的山豬羊股，武寧的劉宮方股，象州的區振組股，潯州的謝紅殿股，都是其中最有力量的。清兵到處剿討，疲於奔命，上帝會就乘機活動，到處

搗毀廟宇偶像，與地方紳士衝突日趨劇烈。「各教徒咸覺有聯合一體共禦公敵的必要。彼等將田產屋宇變賣，易爲現金，而將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均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產制度，人數愈爲加增，而人人亦準備隨時可以棄家集合。」（「太平天國起義記」）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官府捕洪秀全甚急，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復因鵬運山（桂平屬）燒炭工人（上帝會羣衆）反抗官府勒索，遂直接引起金田村起義。六月，太平軍在紫荊山前金田村豎立義旗，陸川、博白、花洲（屬平南縣）、白沙（屬桂平縣）各地也同時起義。十月，各地會衆到達金田，十一月，大破清軍。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八月攻克永安州（今蒙山縣），建立太平天國。太平軍駐永安州半年，頒行各種制度，粗具建國規模。秀全被推爲太平天王，再由天王大封官職，王是最高官職，分四等：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列一等，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列二等，翼王石達開列三等，「以上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太平天國政制、軍制、曆法都是馮雲山訂製的，他當然知道節制權應屬天王，但楊、蕭取得代天父天兄發言權，事實上秀全早受楊、蕭，主要

是楊的節制，論宗教地位及起義功績，雲山不在楊蕭下，也因同樣事實，不得不退居第三位。天地會以「反清復明」爲宗旨，並非宗教團體，洪大全用天德年號，天下大元帥名義與上帝會聯合，地位是對等的。可見領導集團內部的分歧，在建國伊始時便已暗伏。太平軍初期，清軍每戰必敗，清政府見太平軍聲勢擴大，知不可輕侮，乃調集軍隊數萬實行圍剿。太平軍突圍，大破清軍，乘勝進攻桂林，攻克全州，進攻長沙，克服岳州。在進軍途中，洪大全被俘於突圍，馮雲山戰死於全州，但獲得大量船隻兵械及槍礮，實力大增，決心進攻湖北。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十二月佔領武漢。一八五三年一月，太平軍水師有船一萬艘，載糧食軍火財物蔽江東下，陸軍夾兩岸前進，水陸號稱五十萬人。沿路民衆踴躍從軍，聲勢浩大，清軍喪膽，望風披靡。太平軍沿途發出奉天誅妖檄、諭救世人檄文、奉天討胡檄文，連克九江、安慶、太平、蕪湖，水陸號稱百萬。二月初攻克南京。在行軍途中，「沒入財物，必擇達官富紳行之，民間則絲毫無擾也，且每以攫得衣物，散給貧者，並言將來治平，概免租稅三年，鄉民德之。湘楚之民大有『奚我后，后來其蘇』之

概。太平軍至則爭迎之，官兵至皆罷市。」（「太平天國野史」）「天王駕入南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計自金田起義到攻陷南京，爲時不過三年。

太平天國代表農民的要求，在南京頒布天朝田畝制度：「夫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處。務使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廢除封建地主，實現耕者有其田：「分田云者，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爲上上田、可出一千一百斤爲上中田，以下遞減至四百斤則爲下下田。上上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各按家口之多寡（不分男女）以行分田。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踰十五歲以下者一半。如十六歲以上分上上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半，分上上田五分。一家六人，則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半。」這種廢除土地私有制度的政策是與當時太平天國的宗教的農業公社理想相聯繫的。「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

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制，不得多用一錢。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藝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爲之，農隙治事。」此種空想社會主義的藍圖，正如實地反映了農民痛恨貧富不均的心理。廢除私有財產的理想，在實行時表現爲摧毀地主階級實現耕者有其田、官員兵士生活共產化、工業國營三種形式，基本上說來是成功的。太平天國對國際貿易和內地貿易採取自由政策，抽稅極輕。太平天國稅法良好，境內平安，農民購買力增強，自然促進商業的發展。「南京城外，商務發達，秩序安謐，城內居民則衣食豐足，安居樂業。」（英教士洛勃斯克給「香港日報」通訊）誠如一位史學家所說：「太平天國的政策，特別是土地政策，說明太平天國不簡單是和過去一樣的農民戰爭，而正是近代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序幕的農民戰爭。它與過去的原來的農民戰爭有許多不同之處。這種不同，不僅僅是在地域上普及到全國各主要區域，不僅因爲運動本身上吸收了最廣大的羣衆來參加；而還在於它有比較明確的主張，它有較嚴密的組織和各種較進步的政策，也就是說，它帶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特點。」自然，這主要是由於太平天國所處的時代，

和過去歷次中國農民運動所處時代已有着很大的不同所致。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在政治經濟上制定了種種新的法令和制度，在軍事上則戰略多犯錯誤，北伐偏師因孤軍深入而被殲，岳州、武漢、九江、安慶等地又棄而不守，以致南京無可屏障。軍事是革命的骨幹，太平軍將領和士兵都是勇敢善戰的志士，可是在錯誤領導下，雖然戰爭中獲得不少偉大的勝利，到底不能得到應得的果實，革命發展乃陷於停滯。不幸內爭又起，秀清上逼秀全，下壓韋、石，彼此猜忌。楊秀清竟於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南京城圍暫解時，「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同時「北翼二王也密謀殺東王。」（李秀成自述）韋昌輝是豪紳地主出身，野心極大，私自形成一個次於楊黨的韋黨。秀全密令昌輝圖楊，而昌輝竟殺秀清及楊黨數千人。達開責昌輝殘殺過甚，昌輝又欲謀殺達開；達開得知離京，家小卒被殺害。達開至安慶召兵靖難，秀全大懼，乃殺昌輝。達開回京助理政務，衆人歡悅。秀全又起猜疑，利用其兄以挾制達開，達開被迫離京他去，別圖發展。至此太平天國已露崩潰之象，後起的李秀成、陳玉成雖忠勇善戰，仍無法挽救太平天國

的覆亡。

再說義和團。如果鴉片戰爭後國際貿易中心從廣州移向上海，南中國經濟秩序的驟然變化，成爲促起太平天國革命的一個主因；那麼，甲午戰爭後北中國經濟所起的驟然變化，如開海港、造鐵路、辦郵電、廢漕運等，便成爲促起義和團運動的一個主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貧困統治下，農民大衆無以爲生，反帝反封建的農民解放鬥爭便一次次地掀起。太平天國、義和團乃至一九二七——一九三四年的土地革命，基礎上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農民大衆爭求生存解放的農民運動。

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後，各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建築鐵路、強占農田，外國教士藉領事裁判權的保護，到處侵佔農田、壓迫農民大衆，於是激起了中國廣大羣衆的反抗，特別是激怒了中國農民對外國人的仇恨，喊出了「滅洋」的口號。儘管義和團在形式上是以落後的宗教迷信出現的，實際上却代表着廣大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要求。義和拳是舊式農民起義的許多祕密結社的一種，它是白蓮教的一個支派。白蓮教始於晉，盛於元滅宋、清滅明之時，先天賦有反抗外族侵略的革命性，開始

以「反清復明」爲宗旨。因官吏袒教抑民，受教堂指使，不論是非曲直，教民必勝，平民必敗。山東義和拳乃「聚衆抗官，傳單一出，千人立聚，兵力森立，儼同敵國，動言焚殺，官吏莫敢誰何。」（勞乃宣：「義和拳教門源流考書後」）平民受教民欺壓，紛紛參加，抵制官吏和教堂的橫暴壓迫，公稱義和拳爲「義民會」。山東巡撫毓賢正難以應付，恰巧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提倡辦保甲團練，毓賢乃出告示，改義和拳爲義和團，承認其爲民間團練。義和團立「扶清滅洋」及「毓」字大旗，可以公開活動。不久，在洋人干涉下，清政府撤毓賢之職而以袁世凱爲山東巡撫。袁世凱定出嚴禁拳匪暫行章程，極端殘酷地壓迫殺害，激起義和團普遍的武裝反抗。一九〇〇年初春，義和團更從山東北部發展到直隸境內。直隸總督裕祿不能禁，也承認「扶清滅洋」的義和團爲合法團體。當時滿清統治階層對義和團的態度頗不一致：一部分最反動的貴族地主以慈禧太后、端王載漪、大臣徐桐、剛毅、趙舒翹等爲代表，袒護義和團，企圖利用義和團來達到他們的反動目的——誘惑憤怒的農民「排外」而不「排滿」；另一部份貴族地主以榮祿、袁世凱、李鴻章、張之洞、劉

坤一等爲代表，反對利用義和團，他們駭怕農民起來，「排外」不成，反而推翻了滿清的封建統治。一九〇〇年五月，慈禧太后密令義和團進入平、津，燒教堂、殺教民。五月十五日，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被殺，二十日德國公使克德林被殺，二十五日清廷下詔宣戰。二十一日，英、德、法、美、俄、奧、意、日八國聯軍攻陷大沽，繼續攻天津，六月十八日陷天津，七月六日攻北京，二十一日城陷，聯軍大肆搶掠，姦淫燒殺，無所不爲。一九〇一年九月，清政府與八國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終告失敗。

最後說到一九二七——一九三四年的農民運動與土地革命。不徹底的辛亥革命，只是名義上「推翻了專制、建設了共和、成立了民國」，事實上當權的盡是大大小小的「袁世凱」，一個個反動軍閥封建餘孽把中國割據得四分五裂，搶地盤，爭權利，引狼入室，賣國通敵，殘民以逞，無惡不作。眼睜睜地看着中國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踐踏蹂躪之下，工農大衆痛苦到了極頂，孫中山先生爲國爲民，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在廣州改組中國國民黨，揭櫫「聯共、聯俄、農工」三

大政策，使他手創的三民主義更具有充實豐富的內容，使反帝反封建的聯合陣綫得以成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四年至十六年）的國民革命也賴以獲得初步的成功。在國民革命的初期，農民運動已有長足的發展，截至一九二六年底，湖南一省有五十四縣已有農民協會組織，農協會員計有一百零七萬餘人。北伐中湖南農民參戰最勇敢，北伐取得初步勝利，農民鬥爭也跟着擴大起來。當時農民一致要求的是：「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武裝起來打倒土豪劣紳。」這種鬥爭最激烈的地方是衡陽、安化、湘陰、瀏陽、醴陵、宜章等地；十月間衡陽減租減稅鬥爭中參加農民羣衆達七萬人以上。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全省農民協會組織已擴大至二百萬人，農民運動達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期，打倒土豪劣紳，並自動起來沒收地主的土地。在一九二六年底，湖北也已有二十餘縣成立農民協會，會員達二十萬人。農民都說：「現在的世界是我們的，今年減租不成問題，連田地都應歸我們插標號。」農民自衛軍也組織起來了。但由於缺乏正確而有力的領導，並沒有使農民運動正常而順利地再大踏步向前發展。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從此農民運動與在野

的中國共產黨發生直接密切關聯，帶來一九二七——一九三四年的土地革命高潮。一九二七年秋中共改變了機會主義的領導，於八月七日召集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的中心口號。從此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蔓延了大半個中國。

中共略具端緒的土改法令，自一九三〇年五月頒佈的「土地政綱」始。其內容很簡單，如關於土地沒收與分配一項，只有如下的規定：「無代價的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財產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地少的農民使用。」「祠堂廟宇教堂的地產，及其他的公產官產，或無主的荒地沙田，都歸農民代表會議處理，分配給農民使用。」「全省區中的國有土地的一部份，作為蘇維埃政府移民墾殖之用，和分配給工農軍的兵士，供其經濟上的使用。」及至同年九月二十日公布「土地暫行法」，在這方面才有較詳細的規定：「沒收的土地一律歸蘇維埃政府分配給地少及無地的農民使用。禁止一切土地的買賣、租佃、典押……等，以前田契、租約、押據等一律無效。」「分配土地的方法由蘇維埃代表大會決定。分配土地以鄉為單位，因為各地的關係與土地分配狀況都極複雜，所以不能有一致

的辦法，只能就各鄉的實際情形決定辦法。土地分配有兩種辦法：一切土地平均分配；只就沒收土地分配，原耕農民不動。分配的標準也有兩種：按人口分配；按勞動力分配。各鄉蘇維埃可以按照實際情形決定適當辦法。」但是，當時要禁止一切土地的買賣、租佃、典押，事實上是做不通的，而且在當時也是不必要的。分地的公平合理辦法是一切土地按人口均平分配，而不是任何其他一種辦法。是由於當時中共未能堅決進行兩條戰綫上的鬥爭，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便發生了極大的偏向，左傾的盲動主義和右傾的機會主義，招致了種種嚴重的軍事政治經濟後果，雖經後期的糾左防右精工簡政加強領導繼續鬥爭，終於無法扭轉劣勢，而使其革命一時遭受很大的挫折。

對於農民階層的分析、分田方法的考究、和土地革命性質的認識，是進行土地革命的正確領導的關鍵所繫，當時不少中共人士在這方面犯了錯誤。「過去在蘇區黨的文件上，曾有所謂『初期性富農』（不出租土地，不僱用工人，只出賣多餘的穀子或做小買賣）要與封建性資本主義性的富農一樣反對，實際上這裏所指出的

『初期性富農』，正是在蘇維埃政權下從封建剝削中解放出來的富裕中農。這是極大的錯誤！」（一九三〇年八月中共中央「最近組織任務」）當時，甚至「反富農看做專門的籌款，不提出剝削作標準，反提出金錢作標準，什麼百元以內的不打，百元以外的就打，這種金錢標準被流氓利用，少數地方弄到上了二十塊錢的和養得起老母猪的也要打起來。」（一九三一年中華蘇維埃軍委會）「對農民階層分析的錯誤，以致影響到實際的工作策略。過去黨內流行一種長工之類為僱農，缺衣缺食為貧農，够穿够吃為中農，有餘有剩為富農，以田出租為地主的分析。此一分析有個好處，便是簡單明瞭，人人易懂，但另一方面却包含了不够的地方。現在凡兩元以上即打，或二十元至兩百元以上即打。」（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共贛西南特委致中央局報告）「對富農的左傾盲動政策，東固，純化兩地提出年關鬥爭，沒收地主富農的鷄鴨豬來吃。萬安因為收政費，藉口打富農，向中農寫出兩元以下的款子。」（「鬥爭」第八期樂安通訊）

前面說過，按人口平分是最妥當的分田辦法，但當時中共無論在立法上在行動

上，却都發生了許多偏向和錯誤。繼「土地暫行法」之後，「土地法」中竟仍存有極大的疏失：「凡較富裕的農民，企圖按照生產工具，分配被沒收的土地，第一次代表大會，認為這是富農有意阻礙土地革命發展，為自己謀利益的反動企圖，須給以嚴厲的制止。」這是對的，但加上「地方蘇維埃政府應根據各個鄉村當地情形，選擇最有利於貧農中農利益的原則來分配土地，或按照每家有勞動力者之多寡，同時按人口之多寡的混合原則，進行分配。或以中農、貧農、雇農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富農以勞動力為單位，人口為輔助去分配」的蛇足，問題便發生了。有一說：「分土地以勞動力為標準（男女自十歲至五十歲為一個勞動力單位）以人口為輔助。應得輔助之非勞動者，所得土地只占一個勞動力所得的三分之一。這一個原則是以勞動力為標準，是站在階級的立場上，是在保護貧農中農的利益上向富農進攻。」（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第九號通告）另外又有相反的一說：「以勞動力為標準分配土地，勞力多的多分，勞力少的少分，這只於富農有利。因為他們不但有勞力，還伴隨充足的牛力農具與資本，不比貧農雖有勞力，但伴隨的牛力、農具、資本很不充足，

甚至沒有。所以，以勞力爲標準分配土地是於富農有利的。即在貧農中說，那些勞力多的貧農家庭，因爲多得了田，便比較勞力少的家庭具備迅速發展爲富農的條件。」（中共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決議）真的，「爲滿足多數人的要求，並使農人迅速得到田地起見，應依鄉村人口數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不採以勞動力爲標準的分配方法。」（中國革命軍委會頒布之「土地法」）而且，「卽就發展生產來說，也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勞力差別分爲有利，閩西就是很好的證據。閩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計要比去年土地未分配時多收百分之二十。」

（中共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決議）

再說土地革命性質。當時中共人士有一種不正確的看法：「土地國有是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主張，並且六大大會明顯指示着：在全國或在重要省分中，已經進行到鞏固的蘇維埃政權之後，中國共產黨卽進而幫助革命的農民，去消滅土地私有權，把土地變爲社會的共有財產。因爲共產黨認爲土地國有乃消滅國內最後封建遺跡的最堅決最徹底的方法，革命已經在一省或幾省首先既然勝利，蘇維埃政權

鞏固和擴大，土地國有口號乃不是一個宣傳的口號，已是一個實行的口號了。應積極作社會主義的宣傳，將民權革命很迅速的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同時，各地蘇維埃已經禁止土地買賣和租借的所有權，農民只有使用權，土地所有權屬於蘇維埃，就是土地國有的實現。」（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中共行委主席團土地問題決議）其實，「在目前革命階段中，尚未到整個取消私有制度的時候，不應禁止土地買賣和在蘇維埃法律內的佃租制度，因為這樣，土地革命中更能發動更廣大的農民羣衆，更能使土地革命發展，更能鞏固蘇維埃的基礎。」（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共中央局第九號通告）準此，江西省蘇維埃在「爲督促分配土地及宣佈土地所有權佈告」中指出：「過去分配土地，把土地所有權收歸蘇維埃政府，禁止自由買賣，農民只有使用權，這種辦法是不妥當的。現在本政府重新規定：凡經分配了的田地，即算分定，得田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的田，這田歸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賃買賣由他自主。田中出產除交納地稅於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吃不完的任憑自己出賣，得了錢來供給自己零用，用不完的由

他儲蓄起來，當地政府不得藉詞罰款，民衆團體也不得勒捐。缺少勞力耕田不了的，准許出租，租價多少，以兩邊不吃虧爲原則，由各地按情議定。」這是正確的政策。

左傾的盲動主義，客觀上助長了右傾的富農路線。「土地問題決議」說得好：「土地革命在目前就是要分，分要分得平，分要分得快，只有從澈底平分田地的鬥爭中才能澈底摧毀封建勢力，樹立革命基礎。但我們土地革命怎樣辦的呢？扯起紅旗子三年不分的、一年不分的、半年不分的，這在贛西南、東江、鄂東、鄂西、湘西以及江浙的紅色區域，差不多是普遍現象，紅軍和游擊隊許多是不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這不只是機會主義，簡直是地主路線。不是站在貧苦農民的階級上代表要分田。這種不分，實際就是保存地主制度。」甚至，「有許多地方的政權落在富農手裏，富農一拿到政權，當然處處都站在富農的利益上去壓迫貧農和中農。他們緩緩地去分配土地，甚至政權建立了多年還不分田地，即使土地分配了，但好的田地都落在富農手中，富農更憑藉政權作威作福，欺壓貧農和中農。當提出打富農的口號

時，在蘇維埃政府中當權的富農，當然不會去打他們同階級利益的富農，於是被打被罰的是中農，甚至貧農也逃不脫。不但如此，富農因想保存半封建勢力，他們好去剝削雇工貧農以至於中農，於是要在蘇維埃區域中，或明或暗的進行反土地革命等等破壞革命的反革命宣傳。」（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共中央局「反富農策略」）再加上誤認發展生產就是「代表富農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往往有意無意地阻礙生產、破壞生產，一遇凶歉，嚴重的糧荒便成爲前方作戰和後方民生的絕大威脅，而反動份子更乘機猖獗起來。「主張拋棄蘇維埃根據地，而向後方逃跑，不主張擴大紅軍，擴大地方武裝，反而公開的主張取消羣衆團體組織，取消無產階級政黨對羣衆的革命鬥爭的堅決領導權」的「羅明路線」，特別活躍於一九三二年的江西赤區經濟大恐慌之際，便是很好的例證。由於這種種原因，一九二七——一九三四年的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終於未竟全功而中途挫敗。

四 中國農民運動的現階段

中華民族的死敵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一步步逼緊，一次兇過一次，到一九三七年夏季，日寇的侵略已成爲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絕大威脅，抗日戰爭終於在全國人民一致要求下展開。農民是站在最前綫的英勇戰士，大敵當前，國難嚴重，農民爲顧全大局，處處委曲求全；在戰後民主農村中，農民有自己的武裝和政權，但對地主的土地私有仍予承認，只以減租減息的方式來進行緩和的土地改革，並普遍實行換工、變工等方式的農業勞動互助，發展農村生產。抗戰勝利後不久，又爆發了內戰，農民經過長期的軍事政治教育，變得更加堅強壯大而有力量，在廣大的解放區內，農民把土地改革繼續向前推進一步，從減租減息、清算退租到徹底平分土地。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以「消滅封建以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來滿足農民的要求，這樣，便帶來了中國農民運動的最高潮。

先說抗戰期間的減租減息運動。一九三七年冬，首先在晉察冀邊區叫出了「二五減租」「一分行息」的口號，廣大農民湧入民主改革運動的隊伍，動員起來參加抗戰生產。接着許多邊區裏的敵後民主農村，也紛紛展開了同一運動。根據晉察冀邊區政委會公佈的「晉察冀租佃債息條例」規定：「凡出租出佃之土地，不論其地租爲實物或現金，出租出佃人應一律按照原租額減收百分之二五。」「減租後之租額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穫額千分之三七五。」「現扣利、出門利、印子錢等高利貸一律禁止。」「舊債之清理，其利率在年利一分以上者，一律按年利一分計算。債務人已付利息超過原本一倍者，停利還本，其超過原本二倍者，視爲借貸關係消滅，本利停付。」這樣，一般的租率減低了，佃農大致只出原租額的三分之一。同時並掀起了清理舊債和「抽地換約」運動，即「未死」之抵押地得按年利一分訂立新約，將土地抽回；許多戰前被高利貸者強取豪奪了的土地均被農民收回，佃權也有了很大的保障。苛捐雜稅取消了，代之以公平合理的統一累進稅。由於減租減息的實行，農民羣衆生產情緒大爲高漲，農業勞動互助盛行，農業生產力獲得了很多

的提高。在蘇皖邊區，也掀起了減租減息的高潮。原來是對半分租的，改爲地主三五、佃戶六五，四六分的改爲三七，三七分的改爲二五、七五。或是按民國二十六年的實交租額減收，地主不得超過正產物收穫量的百分之三五。並且要主佃重訂新約，舊欠一律免交。舊債按二分起息，如果利過本，就停利還本，利兩倍於本，就本利停付。「陝甘寧邊區、晉綏邊區、晉冀魯豫邊區等地，也普遍實行減租減息，估計至少有五千萬農民，捲入這一熱浪之中。因此，農民對於土地的要求和擴大生產的興趣大爲提高，不斷買進、典進或贖回土地，農村土地關係和階級關係因此起了顯著的變化。首先，土地關係的變化，是循着與抗戰前相反的方向進行的，典出賣出土地的多屬地主與富農，典進買進土地的多屬中農、貧農，甚至雇農和工人。農村中各階層的變化消長，乃以兩極縮小、中間擴大爲其基本規律。地主經濟逐漸削弱，中農經濟膨脹發展，而雇農貧農則在迅速上昇。富農經濟在初期有着某些下降，但沒有多久又開始上昇了。它所以一度下降，除了在戰爭環境中受敵人的掠奪破壞外，是因爲它過去也帶有封建剝削性，但由於土地改革使封建剝削消滅，奠定

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所以富農經濟便逐步發展了。

隨着抗戰勝利結束，土地改革也從減租減息走向清算鬥爭。在「有冤報冤、有仇報仇、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口號下，農民紛紛參加清算鬥爭運動。到處洋溢着農民要求土地的呼聲：

萬物土中生，離土活不成。

窮人不是命不好，只怪田地少。

窮人要認清，泥土是黃金。

無田有力沒處用，看人種田心酸痛。

田地是活寶，人人少不了。

田是活財神，自己做主人。

田地是黃金，有了才鬆心。

種田不怕沒飯吃，紡織不怕沒衣穿。

要得大翻身，有田才能保住根。

窮人要出頭，全靠田和牛。

窮沒根，富沒苗，有田耕種全沒焦。

剝削人家便宜財，應該要他還出來。

只有自己有田種，下苦才能有精神。

因為自己田地少，才替人家扶犁梢。

.....

真的，田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他們痛感土地的飢餓，他們「離土活不成」；

這樣，佔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便操縱了他們的命根子，以苛重的封建地租壓榨他們的血汗膏脂。如今，農民再也不能忍受了，再也不肯受騙了，他們比任何人都明白：「窮人不是命不好，只怪田地少，」「要得大翻身，有田才能保住根。」於是，他們怒吼了：「剝削人家便宜財，應該要他還出來！」於是，如火如荼的分田運動，清算鬥爭，便到處展開在民主農村中，農民終於「揭了石板，挖了窮根」了。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適時地發佈「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大意

是：第一、對於日寇和大漢奸的土地，對於過去魚肉鄉民的惡霸從農民手中所霸佔的土地，對於滿清時代所殘留的「皇糧莊頭地」，對於不法地主的「漏稅地」，對於過去從農民手中強佔的「公地」等，都予以沒收，分配給無地的農民。第二是進行反奸清算，儘量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並進行退租算賬。第三、在減租退租之後，地主自願出賣土地的，佃農有優先權承購；有些地主則可抽回一二成土地去自耕。第四是獻地運動。第五是發行土地債券。同年十二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公佈「征購地主土地條例草案」，準備發行土地公債征購地主土地，以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但是這樣「只翻了半個身」的土地改革，仍不足以滿足農民的要求，於是澈底平分一切土地的日子終於來到，在一九四七年雙十節那一天，中共中央公佈了「關於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及「中國土地法大綱」，號召農民起來「消滅封建以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展開及貫澈全國的土地改革運動，完成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大綱」計分十六條，內容主要是：（甲）分田標準——除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礦山、大牧場、大荒地及湖沼等

歸政府管理外，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各人所有。(乙)分田單位——土地分配，以鄉或等於鄉的行政村為單位。但區或縣農會得在各鄉或等於鄉的各行政村之間，作某些必要的調劑。在地廣人稀地區，為便於耕種起見，得以鄉以下的較小單位分配土地。(丙)分田機關——鄉村農民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鄉村無地少地的農民所組織的貧農團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區、縣、省等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丁)分田監督——為貫徹土地改革的實施，對於一切違抗或破壞本法的罪犯，應組織人民法庭予以審判及處分。在「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後不久，東北解放區民主政府於十二月一日頒布「東北解放區實行土地法大綱補充辦法」十四條。接着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也於一九四八年一月接受「中國土地法大綱」作為邊區土地法，同時製訂並公布「施行中國土地法大綱補充辦法」十六條，中共中央於二月二十二日發布「關於在老區半

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五月二十五日又發出「關於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新華社也於八月九日發表「把解放區的農業生產提高一步」的社論。十一月十日又發表「在結束土地改革的地方，糾左必須防右」的社論。在內蒙解放區、中原解放區，農民運動也掀起了新高潮。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指出內蒙現階段革命的基本政策是：「承認內蒙境內的土地與牧場爲內蒙民族所有，廢除內蒙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與牧場所有制；」廢除封建階級一切特權，廢除奴隸制度，一切奴隸宣告完全解放，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利；」「廢除土地改革前農村中一切地主、王公、高利貸者對貧苦農民與牧民的一切債權；」「農業區實行耕者有其田，原來一切封建地主與廟宇所佔有的土地，一律收歸公有，按人口統一分配給所有無地和少地的蒙漢人民；」「牧畜區實行保護牧羣，保護牧場，放牧自由，在牧民與牧主兩利的前提下，有步驟的改善牧民的經濟生活，發展畜牧」等。中共中央中原局，「爲適應農民目前的需要，改善農民生活，發展農業生產，爭取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也頒布「減租減息綱領」，對已分配土

地浮財之處理，及若干特殊土地問題之處理，也有有利於農民大眾的規定，並以農民協會爲辦理減租減息的合法機關。在不久的將來，新解放區也會達到澈底平分土地的日子了。

現階段的中國農民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反封建、分田地的農民翻身運動，中共「關於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對中國農民運動現階段的性質、意義及其任務，有着極其透闢的說明：

「中國的土地制度極不合理，就一般情形來說，佔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佔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殘酷地剝削人民。而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農、貧農中農及其他人民，却總共只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終年勞動，不得溫飽。這種嚴重情況，是我們民族被侵略、被壓迫、窮困及落後的根源，是我們國家民主化、工業化、獨立、統一及富強的基本障礙。爲了改變這種情況，必須根據農民的要求，消滅封建以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二十年以來，特別是最近兩年以來，中國農民在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實行土地改革，已有巨大的成績及豐富的經驗。今年九月，中國共產黨召集了全國土地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詳細地研究了中國土地制度的情況、土地改革的經驗，製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作爲向各地民主政府、各地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委員會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這個人土地法大綱，並予以公布。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委員會，對於這個建議，加以討論和採納，並訂出適合於當地情況的具體辦法，展開及貫徹全國的土地改革運動，完成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

不久，新華社在一篇題爲「把解放區農業生產提高一步」的社論中，更進一步指出：「一切革命，一切社會改革，其最後目的，都是爲了發展生產；」現階段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在「軍事勝利與土改勝利的完全新的基礎上繼續取得生產上的勝利，才能使革命和改革成爲歷史上的重大進步，」必須「用生產的勝利來鞏固和擴大土改的勝利，來支援和保證軍事上的勝利，並爭取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真的一切革命的終極目的都是爲了發展生產。野蠻落後的長期封建貧困統治，不但使

中國原始資本蓄積無法實現，產業革命無從發生，就連貧弱的農業生產也萎縮不前，農工大衆的生活直降低到牛馬不如，而封建統治階層的浪費奢侈，破壞腐蝕更是反動到了極頂。每當王朝興起之初，雖也曾多少做些「休養生息與民更始」的工夫，然而曾幾何時，土地兼併復趨劇烈，封建剝削更見繁苛，自然條件隨社會條件的惡化而惡化，飢餓的農民仍要負擔變本加厲的賦役征課。不合理的封建生產關係窒息了生產力的發展，末代王朝到處是農村破落、農民流離、赤地千里、烽烟遍地，農民運動於是一次次掀起。農民運動的本身便是代表生產力的擔當者的農民，爲了使生產能繼續進行，生活勉強渡過，而羣起反抗窒息生產的封建統治的一種爭生存、爭平等的「均產運動」。那些含血噴人的歷史僞造者，硬說農民戰爭祇是無目的的破壞和舊秩序的循環過程，徒見其掩耳盜鈴，心勞日拙罷了。事實上，在兩千餘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裏不斷爆發的農民運動，雖然總是在失敗聲中結束，但客觀上他們的行動確實盡了掃蕩腐敗的封建舊政權，從而使中國歷史的繼續前進成爲可能的作用；沒有農民戰爭，我們真難以想像封建社會何以能在這長期中一步不斷前

進。如今，中國農民運動不但已使土地改革在廣大的地區上大部完成並繼續進行，而且確實促使農業生產向前迅速順利發展了一大步。翻了身的農民，在自己的田地上努力生產發家，勤勞致富，用生產的勝利來鞏固和擴大土改的勝利，來支援和保證軍事上的勝利，並爭取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

我們從中國農民運動現階段在土地改革和發展生產的鉅大成績上，十分明顯地看出了新中國光明的遠景。東北解放區在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後，已獲得鉅大的生產成績。截至三十六年七月止，東北解放區（包括吉林、黑龍江、嫩江、遼北、松江、牡丹江、合江、遼寧等八省及熱河省）已有六百二十九萬零六百二十四個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獲得土地五百零三萬一千九百零八垧（每垧十畝），平均每人得地八畝；另據遼北、松江、合江、吉林、牡丹江五個地區不完全統計：農民從地主惡霸手中收回牲口五萬九千一百五十二頭，糧食一百零四萬六千二百八十八石（每石五百斤），房屋十五萬六千一百五十一間，收回浮財（金銀、衣服、雜物）比收回土地的全部價值還大過數倍。農民翻身後生產情緒大增，紛紛湧入勞動互助

的組織，生產效率大為提高。三十六年共計播種耕地一千三百十一萬四千餘垧，比三十五年增加百分之十以上。據三十七年經濟建設計劃的規定，全區增產糧食一百萬噸。該年農業生產在戰勝災荒中完成春耕夏鋤，據松江、合江、龍江、嫩江、遼北、吉林、遼寧、安東等八省與哈爾濱市的初步統計，播種面積達一千一百三十六萬五千三百二十四垧，農作物收成甚豐。嫩江、遼北、松江、合江、遼寧、龍江等六省原計劃開荒四十八萬九千六百垧，實際開荒達五十九萬七千零八垧，超過原計劃百分之二〇·七，今年農業總生產計劃較去年增產糧食百分之十五，即增產一百八十萬噸。華北解放區的大部份地區，已完成土地改革，農民數千萬人分得土地，每人得地三畝至六畝，農業生產恢復極速。去年全區秋收平均有七八成，太行、太岳、北嶽等地區均慶豐收。北嶽、冀中、冀南、冀魯豫各區紛紛擬定冬季生產計劃，並準備三十八年度大生產的進行。全區今年可修復舊水車半數，並增加新水車一萬二千輛，灌溉面積可增加一百萬畝，明年也可增加此數。今年可增加牲口八萬頭以上，明年也可增加此數。全區不出三四年，農業生產便可恢復戰前水準。此

外，在華中、西北、內蒙各解放區，土地改革和農業生產均有很大的成績。

當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獲得勝利後，在完成土地改革、復興農業生產的基礎上，中國便有可能從落後農業國走向工業化的建設之路，從新民主主義經濟逐漸向社會化計劃經濟發展。在工農聯盟的保障之下，富農經濟和私人企業繼續存在並會獲得若干的發展，但決不致成爲「操縱國民生計」的剝削手段。現階段的中國農民運動已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復興農業生產上獲得了很大的成績，它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爲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發揮其偉大的作用，這是可以斷言的。

——完——



4373)